

始创新经学的大师：王国维经学研究述论

宫云维¹

【摘要】 王国维是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著名的学术大师。其治经，跳出了清代以来的今古文之争，把经学还原为独立科学研究的对象，用最新的考古材料来与古经进行比较研究，取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其方法胡适称之为“科学的治经方法”，其人胡适称之为“始创新经学的大师”。王国维以经证史，在古史研究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反过来，以史治经，也为古经的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关键词】 经学 胡适 王国维

王国维是近现代学术史上著名的学术大师，其在文学、史学、哲学等方面的杰出成就早已为学界所熟知。相比较而言，学术界对其经学研究关注明显不够。¹事实上，王国维以经证史，其史学上的巨大成就来自于其扎实的经学研究。他以“科学的方法”，对经学文本进行释读，在成就其“新史学开山”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传统经学的研究。早在1935年，胡适就称其为“始创新经学的大师”²。本文拟对王国维经学研究做一系统梳理，并揭示王国维在经学史上的贡献，以期丰富王国维及中国近现代学术史的研究。

一、王国维经学研究的缘起

其实，王国维早年并不喜欢经学。他自己说小时候“家有书五六筐，除《十三经注疏》为儿时所不喜外，其余晚自塾归，每泛览焉。”³他早年的学术生涯，也是以研究哲学、美学、文学为主。虽然在1894年，他曾条驳过俞樾的《群经评议》，但并不能算作他研究经学的开始。1911年11月至1916年1月，王国维旅居日本期间，才开始转向经史。罗振玉在谈到王国维学术转向时说：

初公治古文辞，自以所学根柢未深，读江子屏《国朝汉学师承记》，欲于此求修学途径。予谓江氏说多偏驳，国朝学术实源于顾亭林处士，厥后作者辈出，而造诣最精者，为戴氏震、程氏易畴、钱氏大昕、汪氏中、段氏玉裁及高邮二王，因以家书赠之。公虽加流览，然方治东西洋学术，未遑专力于此，课余复从藤田博士治欧文及西洋哲学、文学、美术，尤喜韩图、叔本华、尼采诸家之说，发挥其旨趣，为《静安文集》。在吴刻所为诗词，在都门攻治戏曲，著书甚多，并为艺林所推重。

至是予乃劝公专研国学，而先于小学、训诂植其基。并与论学术得失，谓尼山之学在信古，今人则信今而疑古。国朝学者疑《古文尚书》，疑《尚书》孔注，疑《家语》，所疑固未尝不当，及大名崔氏著《考信录》，则多疑所不必疑。至今晚近变本加厉，至谓诸经皆出伪造。至欧西之学，其立论多似周秦诸子，若尼采诸家学说，贱仁义，薄谦逊，非节制，欲创新文化以代旧文化，则流弊滋多。方今世论益歧，三千年之教泽不绝如线，非矫枉不能反经。士生今日，万事无可为，欲拯此横流，舍反经信古未由也。公年方壮，予亦未至衰暮，守先待后，期与子共勉之。⁴

他自己也说：“自辛亥十月寓居京都，至是已五度岁，实计在京都四岁余。此四年中，生活在一生中最为简单，惟学问变化滋甚。”⁵1913年2月，王国维在给缪荃孙的信中说：“移居以后，日读《注疏》一卷，拟自《三礼》始，以及他经，期以不间断，不知能持久否。”11月，他再次提及此事，说：“今年发温经之兴，将《三礼》注疏圈点一过。阮校尚称详密，而误处尚属不少。”⁶日本学者狩野直喜在《回忆王静安君》中说：“我觉得来京都以后，王君的学问有一些变化。也就是说，他好像重新

¹作者简介：宫云维，浙江工商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杭州 310018）

基金项目：浙江文化研究工程(第二期)重大课题“浙江儒学通史”（17WH200202D）阶段性成果

转向研究中国的经学，要树立新的见地，可能他想改革中国经学研究……在京都的时候，他的学问研究的本领在哪些方面呢？当时他精细地重读《十三经注疏》《前后汉书》《三国志》等等……他跟罗君整天讨论学术上的问题，对文字、考古开始发生很大的兴趣。另一方面，他研究经学。这两方面的研究，我以为后来成为他的《观堂集林》里论文的渊源。”⁷

二、王国维经学研究的方法

王国维的弟弟王国华说：“先兄以史治经，不轻疑经，亦不欲以墨守自封，必求其真，故六经皆史之论，虽发于前人，而以之与地下史料相印证，立今后新史学之骨干者，谓之始于先兄可也。”⁸这句话的意思是王国维治经不像今文学家那样轻易怀疑古经的真伪，也不像古文学家那样墨守成规，固步自封，而是“必求其真”，即使前人有“六经皆史之论”，也不轻易相信，必“以之与地下史料相印证”。

《诗》《书》《礼》《乐》《易》《春秋》是先秦时的古书，本无“经”“史”的区分。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学生，并作《易传》，撰《春秋》，才有“六经”之说。西汉时，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六经遂成为儒家的经典，历汉、唐，以至到宋代，一直被当作圣人立言垂教的原典。但元代以后，开始有学者对六经的性质产生了质疑。先是郝经提出“古无经史之分”“六经自有史”的观念；明人潘府提出了“五经皆史”；王阳明提出了“五经皆只是史”。至清初，章学诚著《文史通义》，明确提出了“六经皆史”的概念，称“古之所谓经，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事实，而非圣人有意作为文字以传之后世也”⁹。晚清章太炎则更加致力于论证“六经”为古史官所记的历史，与后世“史书”无别，打破了经学高高在上的垄断地位，使之与诸子百家一样成为研究上古历史的史料，此即近代学术史上的“新史学”。彼时，史学尚未完全脱离经学，研究上古历史尤其经史难分。所以，周予同把“新史学派”称为“超汉宋学、超今古文学而以历史的方法去研究经学的新学派”，王国维则是“以古文学为基点，接受外来考古学的方法，寻求地下的实物以校正记载”一派的“领袖”¹⁰。王国维在其《古史新证·总论》中说：

研究中国古史为最纠纷之问题。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史实之中，固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二者不易区别，此世界各国之所同也。在中国古代，已注意此事。孔子曰“信而好古”，又曰“君子于其不知，盖阙如也”。故于夏、殷之礼，曰“吾能言之。杞、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孟子于古事之可存疑者则曰“于传说有之”，于不足信者则曰“好事者为之”……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¹¹

所谓“纸上之材料”是指《尚书》《诗》《易》《五帝德》及《帝系姓》《春秋》《左氏传》《国语》《世本》《竹书纪年》《战国策》《史记》等传统典籍，所谓“地下之材料”是指19世纪末考古发现的青铜文字、甲骨文字、汉魏石经等新材料。将此“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材料”互相释证，这就是著名的“二重证据法”¹²。王国维不但用这一方法研究史学，也用来研究六经。《观堂集林》中许多关于经学文献的研究，即是用这样的方法研究出来的。

对于王国维的治经方法，胡适大加青睐。1935年4月，胡适在《独立评论》第146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今日还不配读经》的文章，给予了王国维很高的评价：

今日提倡读经的人们，梦里也没有想到五经至今还只是一半懂得一半不懂得的东西。这也难怪，毛公、郑玄以下，说《诗》的人谁肯说《诗》三百篇有一半不可懂？王弼、韩康伯以下，说《易》的人谁肯说《周易》有一大半不可懂？郑玄、马融、王肃以下，说《书》的人谁肯说《尚书》有一半不可懂？古人且不谈，三百年中的经学家，陈焕、胡承珙、马瑞辰等人的《毛诗》学，王鸣盛、孙星衍、段玉裁、江声、皮锡瑞、王先谦诸人的《尚书》学，焦循、江藩、张惠言诸人的《易》学，又何尝肯老实承认这些古经他们只懂得一半？所以孟真先生说的“六经虽在专门家手中也是半懂不懂的东西”，这句话只是最近二三十年中的极

少数专门家的见解，只是那极少数的“有声音文字训诂训练的人”的见解。……这种见解可以说是最新的经学，最新的治经方法。始创新经学的大师是王国维先生。²

文中的孟真，即傅斯年。1935年4月7日，傅斯年在《大公报·星期论文》上发表了《论学校读经》一文，批评陈济棠在广东、何键在湖南等提倡的中小学读经活动。傅文指出“经过明末以来朴学之进步，我们今日应该充分感觉六经之难读。汉儒之师说既不可恃，宋儒的臆想又不可凭，在今日只有妄人才敢说《诗》《书》全能了解，有声音文字训诂训练的人是深知‘多见阙疑’‘不知为不知’之重要性的。那么，今日学校读经，无异拿些教师自己半懂不懂的东西给学生……六经虽在专门家手中也是半懂不懂的东西，一旦拿来给儿童，教者不是混沌混过，便要自欺欺人。”¹³所谓“肯老实承认这些古经他们只懂得一半”则是指王国维而言。1921年王国维在《与友人论〈诗〉〈书〉中成语书》中说：“《诗》《书》为人人诵习之书，然于六艺中最难读。以弟之愚暗，于《书》所不能解者殆十之五；于《诗》，亦十之一二。此非独弟所不能解也，汉魏以来诸大师未尝不强为之说，然其说终不可通。以是知先儒亦不能解也。”¹⁴胡适很看重这段话，不但在《我们今日还不配读经》一文中引用了这段话，还庄重宣布：

这是新经学开宗明义的宣言！说话的人是近代一个学问最博而方法最缜密的大师，所以说的话最有分寸，最有斤两。科学的起点在于求知，而求知的动机必须出于诚恳的承认自己知识的缺乏。²

在胡适看来，古经学所以不曾走上科学的路，完全由于汉魏以来诸大师都不肯承认古经的难懂，都要“强为之说”。南宋以后，人人认朱子《四书集注》、蔡沈《书集传》为集古今大成的定论，所以经学更荒芜了。顾炎武以下，少数学者走上了声音文字训诂的道路，稍稍能补救宋明经学的臆解的空疏。然而他们不肯公然承认他们只能懂得古经的一部分，不肯抛弃注释全经的野心。“浅识的人，在一个过度迷信清代朴学的空气里，也就纷纷道听涂说，以为经过了三百年清儒的整理，五经应该可以没有疑问了。谁料到了这三百年末了，王国维先生忽然公开揭穿了这张黑幕，老实的承认《诗经》他不懂的有十之一二，《尚书》他不懂的有十之五。”²正是由于王国维敢于“老实承认”古经的难懂，敢于“诚恳的承认自己知识的缺乏”，才不会像汉魏以来的经师那样，不明就里，“强为之说”，而是在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用古书的文字作比较的基础上，进一步利用铜器文字和甲骨文字研究的最新进展与传世古书进行比较，通过比较进而确定古经文的意义。这种解经的方法，相对于之前经师的“强为之说”，是“科学的方法”；这种解经的路子是“新经学的路”，也是科学的。因此，王国维是“新经学”的始创者，是“始创新经学的大师”。

三、王国维经学研究的成就

王国维的经学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观堂集林》一书中。是书成书于1921年5月，系王国维自己编辑的，“去取至严。凡一切酬应之作，及少作之无关弘旨者，悉淘去不存”¹⁵。其中《艺林一》到《艺林八》八卷，全都是解经之作，占全书的三分之一。此外，《观堂集林》卷第二十《史林十二》尚有《魏石经考》五篇、《蜀石经残拓本跋》一篇，卷第二十一《史林十三》有《覆五代刊本〈尔雅〉跋》《宋刊本〈尔雅疏〉跋》《宋越州本〈礼记正义〉跋》《书绩溪胡氏〈西京博士考〉昭文张氏〈两汉博士考〉后》等。《观堂别集》中也有《以五介彰施于五色说》《书作册诗尹氏说》《〈诗·齐风〉岂弟释义》《书〈毛诗故训传〉后》《陆法言〈切韵〉断片跋》《〈唐韵〉别本考》《魏鹤山〈唐韵后序〉书后》《宋抚州本〈周易〉跋》《内府藏宋大字本〈孟子〉跋》《影宋本〈孟子音义〉跋》《顾刻〈广韵〉跋》《〈尚书覈诂〉序》等，内容涉及《尚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尔雅》以及音韵、训诂等传统经学的方方面面。是书在体现其古史研究的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彰显了其经学研究的贡献，二者相辅相成，互为成就。试以其著名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续考》《殷周制度论》说明之。

《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续考》的主要学术贡献是厘清了商朝的帝王名号和世系，初步建立了殷商史的基本体系，被誉为“近代学术史上的一大盛事”¹⁶。王国维写作此文的起因，是在帮罗振玉抄写《殷墟书契考释》的过程中，在卜辞中发现了“王亥”之名。“嗣余读《山海经》《竹书纪年》，乃知王亥为殷之先公，并与《世本·作篇》之‘胙’、《帝系篇》之‘核’、《楚辞·天问》之‘该’、《吕氏春秋》之‘王水’、《史记·殷本纪》及《三代世表》之‘振’、《汉书·古今人表》之‘垓’，

实系一人。”遂在罗振玉以及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的鼓励和帮助下，于甲骨卜辞中搜罗到有关王亥的材料七八条，旁加考证，作《王亥》一文。在此基础上，他继续研究，陆续证明了“王亥”即“该”、“王恒”即“恒”等，系统梳理了殷先王先公的世系和名号。王国维的这项研究，除了能帮助理解、读懂上述古文献外，对于《左传》《尚书孔传》《诗》《礼记》《周礼》《论语》等古经书的阅读都很有帮助。例如，《诗·大雅·生民》疏引《大戴礼·帝系》“帝誉夏妃嫫姆之女曰常仪，生摯”，《祭法》“殷人谛誉”，王国维谓“誉为契父，为商人所自出之帝，故商人谛之，卜辞称‘高祖夔’，乃与王亥、大乙同称，疑非誉不足以当之”。“相土”之字，《诗·商颂》《春秋左传》作“土”，《周礼·校人》引《世本·作篇》“相土作乘马”，《荀子·解蔽篇》“乘杜作乘马”，《史记·殷本纪》亦作“相土”，王国维取卜辞与诸文献相佐证，认为“土是，土非”，“相土或单名土，又假用杜也”。这是直接解读古经的事例，这样的例子在文中还可以举出很多。

王国维的研究还间接给古经研究提供了帮助和启发。例如《楚辞·天问》“简狄在台誉何宜”以下二十韵皆述商事，其问王亥以下数世事，计十二韵是记王亥、王恒及上甲微三世之事。王国维据卜辞考证出，《山海经》《竹书纪年》中之“有易”，《天问》作“有扈”，是字误，改“易”为“扈”。下文的“昏微遵迹，有狄不宁”，“昏微”即上甲微，“有狄”即“有易”。“其国当在大河之北，或在易水左右。盖商之先，自冥治河，王亥迁殷，已由商丘越大河而北，故游牧于有易高爽之地，服牛之利，即发见于此。有易人乃杀王亥，取服牛。”王亥之后，王恒不见于他书记载，而卜辞所见王恒，同以王称，其时代自当相接，“《天问》之该与恒，适与之相当”。“《天问》之辞，千古不能通其说，而今由卜辞通之。”¹⁷王国维的这一结论，给后来的《周易》研究者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正是受王国维的启发，1929年12月，顾颉刚在《燕京学报》上发表了题为《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一文，考证出《周易·大壮》六五爻辞“丧羊于易”、《周易·旅》上九爻辞“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咷，丧牛于易”就是商人先祖王亥在有易地方放牧牛、羊，被有易部落首领杀害的故事。¹⁸此说解决了《周易》研究中的一个千古难题，被誉为填补了商代开国史上的空白，在古史研究上意义是很大的。¹⁹1979年以后，杭州大学教授黎子耀撰写了《阴阳五行思想与〈周易〉》《殷商先公先王与阴阳五行思想的关系考索》《〈易经〉中殷商先公先王考实》，也直言是“深受王氏的启发”，“希望能在王氏研究的基础上有所补苴”²⁰。该说后来也被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等出土材料所证实。²¹

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被郭沫若称为是“一篇轰动了全世界的大论文，新旧史家至今都一样地奉以为圭臬”²²。其对经学研究的影响，则比《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更甚。

首先，该文的形成是建立在王国维对古礼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的。王国维研究经学是从研究古礼器开始的。早在1913年5月13日，王国维在致缪荃孙的信中说：“顷多阅金文，悟古代宫室之制。现草《明堂寝庙通考》一书，拟分三卷：己说为第一卷。次驳古人说一卷，次图一卷。此书全根据金文、龟卜文，而以经证之，无乎不合”。²³6月27日致铃木虎雄的信中说：“近年治礼，旁及古文字，拟着手三代制度之研究。一月前成《明堂庙寝通考》一书，全与旧说不合，唯阮文达《明堂图考》之说略似之。维更从吉金文字之证据，通之于宗庙、路寝、燕寝，并视为古宫室之通制。然金文中尚有反对之证据，故其中一部分不能视为定说耳。”²³据笔者对《明堂庙寝通考》一文的检阅，王国维在该文中引用《殷虚书契》中所见的两处“太室”，证明了明堂之制为古代宫室之通制，与宗庙之宫室无异；用吴彝盖、鬲攸从鼎、召鼎、伊敦等铭文，证明“成王、康王、穆王诸庙皆有太室，不独文武庙”；用颂鼎、寰盘铭文所记册命之礼，证明了“庙中太室之为四宫中之广廷”，是典型的用金文、龟卜文等地下材料与《诗》、《尚书》、《周礼》、《春秋》诸传、《礼记》等地上之材料进行释证的研究方法。²⁴1914年8月2日，王国维在写给沈曾植的信中说：“近因蕴公（按：罗振玉）于商周文字发见至多，因此得多见三代材料，遂拟根据遗物以研究古代之文化、制度、风俗，旁及国土、姓氏，颇与汉人所解六艺不能尽同。”²⁵此语是符合实情的。《观堂集林》中的前三卷大都是关于礼乐或礼器的论文。前引1916年8月10日致罗振玉的信中，王国维曾谈到过“讲求礼制尤为儒家所独，其书存者亦最多”，且传世之礼书颇为混乱，这大概是其重视礼的研究的原因。

其次，王国维《殷周制度论》中提出的观点，对经学史和儒学史的研究都有重大影响。《殷周制度论》开篇就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又说：“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移转；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所谓的“新制度”“新文化”，即“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二曰庙数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²⁵尤其是王国维提出周代“立

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的说法,不但于古史研究极有意义,于古经的诠释也有极大的帮助。

有关宗法研究的材料,散见于礼类经书中。如《礼记·丧服小记》:“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祚者为小宗。有五世而迁之宗,其继高祖者也。是故祖迁于上,宗易于下。尊祖故敬宗,敬宗所以尊祖、祚也。”²⁶《礼记·大传》:“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祚者为小宗。有百世不迁之宗,有五世则迁之宗。百世不迁者,别子之后也;宗其继别子之所出者,百世不迁者也。宗其继高祖者,五世则迁者也。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义也。有小宗而无大宗者,有大宗而无小宗者,有无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²⁶《仪礼·丧服传》:“诸侯之子称公子,公子不得祚先君。公子之子称公孙,公孙不得祖诸侯。此自卑别于尊也。若公子之子有封为国君者,则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此自尊别于卑也。”²⁷如何理解其中的“别子”以及君统与宗统的关系,不但是研究古史的需要,也是解经的需要。从经学的角度说,古经书的记载并不相同,历代的注疏也有分别。例如,《礼》书记载天子、诸侯不行宗法,《诗经·公刘》则记载“食之饮之,君之宗之”,《诗经·板》有“价人唯藩,大师维垣,大邦维屏,大宗为翰”之语,《礼记·郊特牲》有“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诸侯”,《左传·文公十二年》则有“宋祖帝乙,郑祖厉王”的记载。王国维通过研究甲骨文、金文,发现殷代尚没有嫡庶之制,周代才有立子立嫡而生宗法制,他由此而得出“此制为大夫以下设,而不上及天子、诸侯”“天子、诸侯,虽无大宗之名而有大宗之实”“大夫以下,君统之外复戴宗统,此由嫡庶之制自然而生者也”²⁵的结论,对于阅读和理解经书中的相关描述显然是极有意义的。

此外,王国维关于汉魏石经的研究,也是其“新经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王国维之研究石经,缘起于撰《史籀篇疏证》。籀文即大篆,春秋战国间流行于秦国的一种字体,因著录于《史籀篇》而得名。《史籀篇》亦称《史篇》,共十五篇,为古代文字之祖,刘向校书时始著录,汉武帝时已亡六篇。东汉许慎撰《说文解字》,于聃、缶、女三部三引《史篇》二百二十余字,谓之籀文。1916年2月,王国维从日本回国以后,以甲骨、金文疏证《说文》之籀文。在撰写的过程中,王国维发现籀文系战国时秦国所用之文字,不行于东方诸国;东方六国则用孔壁中所见之“古文”,其作法体势与籀文殊异。由此发其端,王国维研究出司马迁作《史记》所据之古书,凡先秦六国遗书,如《春秋》《国语》《春秋左氏传》《孔子弟子籍》《周官》《尚书》《礼》等,皆是古文;东汉之初,所谓“古文”,专指孔壁之书,“古文”二字由书体之名而变为学派之名。汉时古文经本有转写本,两汉古文学家多小学家。至于“科斗”文字之名,西汉时专指孔壁发现的古文,东汉末则以《古文尚书》为科斗书。魏晋以后,凡异于通行之隶书,皆谓之科斗书,其意义与汉人所谓古文,不尽相同。²⁸

王国维的上述新发现,为其研究魏石经打下了基础。1916年4月20日,王国维拟考黄县丁佛言(1878—1930年)所藏《魏三字石经残字》(拓片),取杨守敬(1839—1915年)所印拓本比照,排列其行款,始知每行经文二十字,三体合计,则六十字。又据此行款以求《隶续》所录残字,亦每行六十字,凡《隶续》所存字亦可图其残石形状,惟所存残石在碑之上或下则不可确定。历经数月的不间断的增改,直到9月14日,才将全稿及碑图写定。其间,7月18日王国维在给罗振玉的信中说:“《魏石经考》上卷已写成,得十九页,虽甚粗漏,然前人实罕用此方法,故所解决问题实颇不少也。”²⁹王国维所解决的“问题”,包括汉石经的经数,魏石经的经数、石数,魏石经的字体特点等,基本排定了熹平石经和正始石经之行款字数、碑数。在此基础上,王国维又撰写了《汉魏博士考》一文,引经据典,梳理了博士之沿革及其职能变化等,“比较系统地对汉魏博士作了初步总结”²⁹,对经学史研究“有很大的价值”³⁰。当代学者虞万里称王国维的研究“是二十世纪初叶用新视角、新方法、新材料研究石经的典范,为全面研究、复原汉魏石经奠定了基础”“为研究汉代古文经学和古文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³¹。

注释:

1 据笔者涉猎所及,相关的研究主要有黎子耀《〈易经〉中殷商先公先王考实——纪念王国维先生逝世六十周年》[《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2期]、刘墨《王国维的经学研究》[《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虞万里《王国维之魏石经研究》(《古文献研究集刊》第四辑,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王刚《王国维经学路向与新史学之构建》(《学术月刊》2013年第11期)、彭华《王国维与〈周易〉研究》(《周易研究》2014年第5期)、王治洋《论王国维经学研究的现代学术品格——以〈魏石经考〉为例》(《孔子研究》1917年第5期)、虞万里《王国维〈魏石经残石考〉撰作年月指实》(《文史》2020年第2期),以及徐建《王国维经学研究》(济南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等,部分研究王国维的著作中也间有提

及，尚无系统梳理其经学研究之著述。

2 13 16 17 胡适：《我们今日还不配读经》，《独立评论》第 146 号，1935 年 4 月 14 日，第 2~4 页。

3 王国维：《静庵文集续编·自序》，载傅杰编校《王国维论学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407 页。

4 罗振玉：《海宁王忠愍公传》，载陈平原、王枫编《追忆王国维》，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8~9 页。

5 袁英光等编：《王国维年谱长编》，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40 页。

6 房鑫亮编校：《王国维书信日记》，浙江教育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46~47、49 页。

7 狩野直喜：《回忆王静安君》，载陈平原、王枫编《追忆王国维》，第 343~344 页。

8 王国华：《王静安先生遗书序》，载陈平原、王枫编《追忆王国维》，第 2 页。

9 章学诚：《经解上》，载叶长青注、张京华点校《文史通义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03 页。

10 周予同：《群经概论》，载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21 页。

11 王国维：《古史新证·总论》，载《古史新证》，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2 页。

12 关于王国维“二重证据法”及其意义，可参见吴怀祺《王国维二重证据法和古史新论》，《河北学刊》1987 年第 5 期；陈其泰《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形成及其意义》，《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5 年第 4、5 期；乔治忠《王国维“二重证据法”蕴义与影响的再审视》，《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 4 期。

14 傅斯年：《论学校读经》，《独立评论》1935 年第 146 号，第 8 页。

15 王国维：《与友人论〈诗〉〈书〉中成语书》，载王国维著、彭林整理《观堂集林》（上），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40 页。

18 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载房鑫亮、胡逢祥主编《王国维全集》第 20 卷，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462 页。

19 袁英光：《王国维》，载《中国史学家评传（下）》，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220 页。

20 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载彭林整理《观堂集林》（上），第 259~267 页。

21 顾颉刚：《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载《古史辨》第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第 1~44 页。

22 胡道静、戚文等编著：《周易十日谈》，上海书店 1992 年版，第 35 页。

23 黎子耀：《〈易经〉中殷商先公先王考实》，《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 年第 2 期。

-
- 24 廖名春、陈慧：《清华简〈保训〉篇解读》，《中国哲学史》2010年第3期。
- 25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自我批判》，《十批判书》，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5页。
- 26 27 29 36 房鑫亮编校：《王国维书信日记》，第48、60、62、137页。
- 28 王国维：《明堂庙寝通考》，载彭林整理《观堂集林》（上），第72~83页。
- 30 34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载彭林整理《观堂集林》（上），第287~288、292~293页。
- 31 32 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867~868、914~915页。
- 33 郑玄注，贾公彦疏，彭林整理：《仪礼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10页。
- 35 参见王国维《〈史记〉所谓古文说》《〈汉书〉所谓古文说》《〈说文〉所谓古文说》《汉时古文本诸经传考》等。
- 37 周予同：《博士制度和秦汉政治》，载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本）》，第728页。
- 38 周予同：《中国经学史讲义》，载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本）》，第837页。
- 39 虞万里：《王国维之魏石经研究》，《古文献研究集刊》第四辑，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第63页。